

时光集结号（组诗）

——写给运博八大馆藏文物

■晓 寒

时光,坐在石头上呼吸



（薛微墓石椁，唐代，万荣皇甫村薛微墓出土）

盛唐的一截体温
密藏在汾阴的土层下
三十四方青石咬合着
半阙漏字的唐诗
脊瓦的弧度还托着当年的月光
每道刻痕都在呼吸
吐纳着
一千三百年的风霜

侍女们从石头里走出来时
衣袂还沾着长安的柳絮
高髻簪花斜插着盛唐的慵懒
指尖悬着半开的牡丹
静默里
体态漫溢出釉色的丰盈
历史让几方石块拼接
石头却不懂得僭越的暗语
空白的谥号像块未刻字的砖
压着半座王朝的谶语

现代的灯光
在石块上面滑冰
那些沉睡的线条开始舒展
繁华在凿痕里结痂
兴衰成了失色的牡丹
历史最终凝成一层
厚厚的包装
已老的时光 从未真正老去
只是换了种方式
坐在石头上呼吸

骨折的时光



（别人守圉铜挽车，西周，闻喜上郭出土）

历史 一截截断骨
在纹饰里生长
车轮碾过三千年的月光
那些墙檐纹正在蜕皮
青铜在无力地咳嗽

车上的鸟兽都醒着
嚎啕历史凝固的血痕
每一道裂痕都是精细的刻度
丈量它与故乡的距离
故乡咫尺
三千年的风尘
却回不到故乡

此刻
断肢 生出新芽
正顶破博物馆的玻璃
想要拉着整座城池
回到某个未被劈开的黎明

方言,扎根最初的泥土里



（饗餐纹方鼎，商代，平陆前庄遗址出土）

泥土松开指节时
你正把三千年的晨露
封存岁月的褶皱里
三足鼎立的沉默
比中条山更懂得负重

兽面纹咬住时光的尾巴
鼎耳上,还挂着
前庄先民未燃尽的炊烟
那些被青铜铭记的火
在陶范里冷却成星斗
当考古铲敲醒沉睡的晨昏
你腹腔里晃荡的

仍是初见时
醉醺醺的月光
历史踉踉跄跄的步履
谁也扶不稳

此刻,玻璃展柜外
有人指着你的裂痕
谈论一个王朝的伤口
而你稳稳站着
像大地未说出口的那句方言
把根,扎在最初的泥土里

时光的釉色



（黑色三角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芮城东庄遗址出土）

泥土与火焰在窑房里私语
时光的窑炉正焙热
一团黏土的记忆
黑三角从陶坯深处浮起
像与先民约定的暗号
轻轻叩问
那些石器与骨针未解的谜题

几何线条
是先民指尖划过的星芒
一缕狩猎的风
画出猎犬踏过的草浪
皮革的褶皱里
还缠着篝火的光芒
裂纹是岁月的走笔
每道沟壑
都是历史的抬头纹
半粒野麦还卡在缝隙里
缺口边沿的牙印
正对着千年后的询问

简单的素描
瘦身历史
一个普通的陶盆
盛满六千年时光
黑色三角纹在光影里轻晃
隔着时空的先民
递来半块带釉的月光

时光的注口



（短流爵，夏代，夏县辕村采集）

时光的注口
斟满夏代的月光
祭祀的酒浆
顺着爵沿,渗进
岁月的缝隙
一身酒气的历史
走了几千年

绿锈是岁月结的痂
每片斑驳
都藏着一个王朝的故事
爵杯里的月光
照不亮寻常百姓家
一滴滴酒香
历史 一滴滴的眼泪
当目光轻触玻璃展柜
仿佛摸到历史不清晰的指纹

一个杯子
站成岁月深情的符号
不敢倒置
怕流出来的泪
湿了历史

留痕的时光



（密云太守霍扬碑，北魏，原竖立于临猗霍扬墓地）

岁月斑驳
时光留痕
密云太守的名姓
正与青苔博弈
文字
是褪色的鳞
游过风雨
那些被拓片
复制的故事
在碑角喘息

马蹄叩响一个郡县
政令的种子
种进泥土
暖色的炊烟
长成民生的样子
而如今
碑如沉默的证人
看我们用目光
反复擦拭历史的锈迹

岁月的最厘
驮着憔悴的过往
孔洞
一声古老的叹息
穿过千年的时光
洞悉
青史
的重量

时光的墒情



（霁蓝釉三彩珐华罐，明代）

在时光展台
你腆着将军肚
霁蓝釉
轻数历史面容
三彩似星子
于历史长空
熠熠流辉

珐华纹路间
锁着明代的风
炽热窑火
烘暖旧时的柴垛
泛蓝的釉光
是苍穹遗落的碎玉
岁月沿着釉面攀爬
每缕色彩
都是时光肥厚的墒情

你威武静立
承接日光的潮汐
触摸明代温度
真想碰一碰瓷
听听
历史的回声

时光的注脚



（青铜“一刀平五千”货币，新莽时期，芮城县出土）

单薄的身躯
称量着
历史的风云
幽微的角落
一把
凝霜的钥匙
打开时光的城

长满绿锈的符号
是历史笨拙的签名
帝国繁华的梦
错银金光
没有锋芒的刀
却让岁月刀光剑影
历史
在光阴里交易
你在掌心
托着历史的重量

褪色的币文
藏着一个王朝的注脚
天圆地方的“一刀平五千”
承接远去的荣光
此刻
目光的温度



鹤雀楼

抗战题材经典美术作品长廓
东渡黄河（中国画）
殷会利 作

故乡情结

北杨情缘

■张先引

我与北杨的情缘,还得从老父亲说起。他老人家1921年出生于荣河县北杨故里。

荣河县城最早是在黄河岸边的宝鼎村。后黄河水东泛,将县城淹了,才不得不东迁坡上冯村,也就是现在的荣河镇。尽管县城早已迁走,但当地老百姓还习惯称宝鼎村为“老城”。出了老城东门便是一道长坡,因坡上建有一座古寺庙,人们便把此坡称为“寺坡”。上了寺坡,便是北杨村。

北杨村历史上有崇尚读书的良好风尚,出了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是当地有名的文脉村。“出东门,上寺坡,北杨秀才比驴多。”在这句古老的民谣中,虽说用了有失大雅的词句,但从中可以看出北杨村历史上确实是人才辈出。后来,人们又对北杨村有了新的总结:“站在村中四面看,举人进士翰林院,副贡岁贡人七个,五届拔贡六十载,文武秀才百余人,光宗耀祖二百年。”是不是更具体、更具有说服力了?父亲出生在北杨,应该说是一种荣耀了。但父亲对于身世,不知何故,却从未向我们提起过,我想这其中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关于老父亲的童年时代,我还是从庙前村他孩提时候一位贾姓的小伙伴口中知道了一些。

父亲原本姓武。武氏家族在北杨村可谓名门望族。父亲祖上经商,主要经营粮食买卖。家里最早经营粮食买卖的总字号设在陕西省三原县,买卖鼎盛时期分号一直西扩到宝鸡和甘肃天水一带。

流年似水,沧海桑田,风水轮流转。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延续到祖父这一辈,家道开始败落,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他甚至将妻儿抛在北杨村老家不管了。祖母和父亲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生活没有着落。为了生计,祖母不得不另寻出路改嫁了。男方家里有一个和父亲年龄不相上下的儿子,两个男孩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发生口角。倔强的父亲不愿意寄人篱下看别人眉高眼低,年仅七八岁便愤然离家出走。不!不能说是离家出走,因为他已无家可归,何谈离家出走?确切讲是离开祖母独自谋生,四处漂泊。

出荣河县城西门,下一道长坡便是古老的黄河。在黄河岸边建有一座规模宏大、雄伟壮观的后土娘娘庙,堪称中国后土庙之最。常年四季,前来祈福进香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庙前黄河岸边有渡口,不论是顺水漂流的货船,还是东西摆渡的渡船,经常在此停泊。后土庙前是一条商业街,人们称之为“庙前街”。庙前街两旁商店鳞次栉比,街道上的行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在中国,许多大的庙宇在大殿前都建有戏台,也有为数不多建有两座舞台的,人们称之为“对台”。但这里在后土娘娘大殿前同时建有三座舞台,在全国也实属罕见。每年农历三月十八庙会,三座戏台同时开唱,参演剧团都要拿出看家戏,每位演员都会使出各自的拿手绝技。精彩绝伦的演出,吸引来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赶庙会、看大戏,庙前街可谓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年幼的父亲流落在庙前街头,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白昼迎浪餐风,在渡船上给人家装船卸货,晚夜独自栖身于后土娘娘庙里。遇到阴天下雨没有活干的时候,只好给人家小吃店洗盘子刷碗,混得一点残羹剩饭。父亲年将成丁,时遇军阀混战、民生涂炭,迫于生计,匹夫报国,慨然从军,曾激战于抗日前线,苦斗于解放战场,在解放甘肃天水的战斗中不幸负伤,荣归故里。

父亲十多年戎马生涯,居无定所,荣归故里后已过婚配年龄,无奈在亲朋撮合下,入赘到安昌村。

父母婚后又重情深,苦乐与共,勤奋耕作,孝养高堂,养儿育女,和睦邻里。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3年,母亲不幸突染沉疴,百医无效。父亲之命,何至于苦涩如是:少年即失父母呵护,中年又痛别爱妻。四月襁褓之弟,嗷

嗷待哺;九岁体弱之姐,需加温恤。是年,我方三岁,怅然失恃,苍天不悯。安昌祖父母年高多病,终日相对涕零。此时的父亲,上需孝敬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下需抚养皆幼的儿女,真的是痛心疾首,苦不堪言。为高堂、为儿女,他身兼数责,弦不再续,凄然独处,进退如仪,如此者四十春秋,直至把祖父母养老送终,把我们姐弟仨拉扯成人。父亲于苦中挣扎之际,出任安昌贫协主任,仗义执言,一心为公,调拨拔弩张之衅,化干戈为玉帛;解妻离子散之隙,使破镜得重圆。

依稀记得我七八岁时,秋庄稼已播种完,父亲领上我和弟弟回过一次他的原籍北杨故里去看望生父。

在北杨村南巷西侧有一条很窄的小胡同,胡同最多有两米宽,祖父家就在小胡同中段北边那座院落。院落好像是四合院基,只有南厢房和上房,没有门房和北厢房。

我和弟弟顺着窄胡同往西出了村子,站在村边往西俯瞰,坡下的村子沿黄河东岸一字排列,密度很大,村与村几乎相连,房舍密密麻麻就像蚕卵一般无序而卧。再往远眺,如带的黄河尽收眼底,河水在橘红的夕阳照耀下波光粼粼,给人一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顺着窄胡同往东是一条较宽的大巷,称为南巷。南巷的东侧,也就是出了窄胡同往北一点的斜对面,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听说这座石牌坊,是北杨村武氏家族五门族人所建。我久久地、久久地徘徊在石牌坊下,时而凝思,时而静观,通过时空一下子把我带到几百年前……我仿佛从石牌坊看到了武氏先祖们昔日的成就和辉煌。

出了窄胡同往南有一眼深井,井的深度是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坡下黄河岸边的孩子所未曾见过的。安昌村的井深不过20米。常言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十一二岁时就独自挑上铁皮水桶到井上绞水、担水。有一次,不小心把水桶掉进井里。村里的井都没有井厘,井厘是光线较暗,捞桶时需要两面镜子,一面镜子在太阳地把阳光反射到井口的镜子上,井口的镜子再把太阳光折到井底,然后把我捆绑在井绳末端,用轱辘把我放到井里打捞水桶。北杨村的井深百十来米,井台高出地面有一二尺,井台旁边还有长方形的石槽,石槽比水桶稍高一点。井台上有一座安装轱辘的井架,轱辘正对着井口,轱辘弯曲的铁绞手把,比我们坡下沿河村庄的轱辘把长得多,可容三四个人共同摇绞。铁轱辘把与人手长期摩擦,在阳光的照耀下明光锃亮。绞水的井绳据说有200多米,井绳的两头各拴绑一个水桶,绞水时有水的桶和空桶一上一下交替进行。这水桶呈锥形,便于桶到井底接触水面后立即倾倒灌水,坡上的人好像称这种桶叫“柳罐”。绞上来的水立即被倒入石槽,再从石槽流入接在下面的水桶。我小心翼翼地来到井边,使头朝井底探看,黑咕隆咚的一眼望不到底。故乡方言把凿井叫“打井”,我不知道如此深井在打井的过程中遇到塌方该怎么办?到了一定深度下面是否还有空气?当年没有电灯照明,井下能见度如此之低人们该如何劳作?桶万一掉进井里又当如何打捞?这一连串的问候一时让我感到心累,又不由联想到当年凿井的不易。饮水思源,后辈吃水的人绝不能忘记先祖的付出和凿井人的艰辛。

饮用井水对于地处坡上的北杨人来说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为井太深,绞一桶井水委实不易!所以坡上人一般情况下是不吃井水的,平时吃的都是泊池水。

坡上的村庄,每个村子都在村子的中央低洼处挖有池泊。池泊的大小、数量,是根据村子大小和人口多少而定的。池泊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饮水池泊,另一种是洗衣池泊。水的来源主要靠天雨,每逢下雨,大街小巷的雨水携带杂七杂八的枯枝烂叶,甚至动物的排泄物,从四面八方汇

集到村子中央的池泊,必须经过沉淀方可饮用。

从南巷深井处往北一百来米便是一个大池泊,我不知是洗衣的还是饮水的。只看见里面的水已抽干,底部的淤泥也清理干净了,铺垫了一层二三十厘米黏性极大、密度极高的陆土夯实,然后再铺垫、再夯实,直到池底瓷光板硬不渗漏水为止。我当时把它称之为修池或补池,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坡上的人们给“修池”起了一个比较雅致的名称,把它称之为“初池”。说“修池”也好,叫“初池”也罢,当时那种宏大的场面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震撼。

对于一个村庄而言,不论是挖新还是挖老,在当时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机械化程度还相当落后,既没有打夯机,也没有碾压机,初池只能采用原始的打夯方式。

打夯的主要工具是“创”。“创”有大小不同三人型和四人型之分。三人型“创”,是在大约15厘米粗、1.5米高的圆木下方套上约20斤的铸铁“创”头,“创”身有三根等距离的“创”手以及三根等距离的“创”扶。劳作时,右手提“创”手,左手扶“创”扶,三人同时用力,不歪不斜,一“创”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坑。三人型的“创”比较轻,也就是二三十斤重;四人“创”与三人“创”相比较就重了很多,是在一根不到一米高的树桩分十字嵌进四根“创”手,“创”头镶嵌有四五十斤重的方形平底黑青石。一般是三人“创”在前面排砸,四人“创”在后面压平。

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看见池泊周围彩旗猎猎,下面人山人海,旁边看热闹的老人小孩人头攒动,很有气壮山河的意思。

一二百人,几十杆“创”同时工作,为了步调一致,劲往一处使,专门让一位嗓门洪亮、词汇丰富又具有相当指挥能力的长者出任指挥。人们把他叫“创人”。“创人”就像战场上严阵以待的指挥员,脖子上挂一只小哨,右手执一铁皮喇叭。开“创”时,只听见“创人”一声长长的哨响,刚才还乱哄哄的工地顿时便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哨声就是命令,“创手”们一个个全神贯注,严阵以待。“创人”对着喇叭筒一声令下“起创了”,众人齐和“嘿呦!”“起了窝呦,嘿呦!”“往前挪呀,唉嘿呦!”“齐使劲呀,嘿呦!”“小心脚呀,哎嘿呦!”“创抬高呀,嘿呦!”“使劲地砸呀,哎嘿呦!”“谁不用劲呀,嘿呦!”“砸谁的脚步呀,哎嘿呦!”“砸了脚呀,嘿呦!”“受恁惶呀,唉嘿呦!”……几百人联合发出的那种原始的、豪放的、拼了命的“嘿哟”声直冲云霄,几十杆“创”同时砸下让大地也颤动不已。这“嘿呦”的号子声和落“创”的震颤感,酣畅淋漓地合奏了一曲“初池”交响乐或者说是大合唱,足以惊天动地泣鬼神。

在当下,最时髦、使用最多的词汇恐怕是“文化”,吃个饭要称“食文化”,喝口茶还要称“茶文化”,对于这撼天动地的“初池”,我姑且把它称之为“初池文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历史的前进,这个“初池文化”将会渐行渐远,走向消亡。每每想起儿时在北杨观瞻的“初池”场景,一种对“初池文化”的眷恋之情便油然而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已到当时的晋南专署所在地临汾工作了。有一次,我到临汾发电厂采访,认识了在电厂工作的北杨籍人士黄进才,便以北杨村为纽带,认了这门老乡,从此后来往甚是频繁。每逢他回北杨故里探亲,我总要给祖父买点糕点等吃食托他捎回。前些时,才知道,黄进才已过世多年了。

流年似水,光阴荏苒,弹指间我已阔别故乡将近60年。6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把北杨想念,因为北杨这块热土与我有着永远割不舍、剪不断的缘。